

从“味蕾消失”到“口感如同神赐”

——论《孩子的愤怒》中的场域依恋建构

文永超

(四川外国语大学 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重庆 400031)

摘要:人类将情感和意义投射到空间,这种空间则转变为场域。从感官地理学角度看,来自人类身体外部的食物通过嘴进入身体内部脏器,打通外部与内部的边界,有助于场域建构和健康场域感的形成。在《孩子的愤怒》中,托妮·莫里森通过书写女主人公布莱德对食物的情感态度变化,旨在阐述:食物是人与空间互动的一种媒介或“阈界”,对食物的依恋与对场域的依恋共同运作。莫里森强调,黑人可以通过饮食活动构建场域身份,形成健康的场域感,从而找到连贯的自我身份。

关键词:食物书写;空间;场域;场域情感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2)05-0062-07

0 引言

托妮·莫里森作品书写黑人文化,从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到最后一部小说《孩子的愤怒》,每部都有饮食活动的细致刻画。科鲁姆赫尔茨(Linda Krumholze)说:“莫里森告诉我们谁吃什么东西,在哪里吃,和谁吃,谁准备食物。”(Krumholze, 2008:276-277)本文聚焦《孩子的愤怒》中黑人布莱德和布克的饮食活动,研究他们如何通过饮食实现场域(place)建构,并找到连贯的场域身份。本研究的理据在于,食物可促成完整的场域身份,正如著名美食家布里拉特-萨瓦林(Anthelme Brillat-Savarin)所说:“告诉我你吃什么,我就可以判断你是什么样的人。”(Shahani, 2018:2)食物是场域身份的标志之一,因为“场域身份是人类自我身份的次结构,从广义看,该结构是由对于个人生活的物理世界的认知构成。这些认知包括行为和体验的记忆、理念、情感、态度、价值观、偏好和概念”(Proshansky et al, 2014:77)。因此,饮食活动是在物理空间发生的一种具身经验,食物和场域身份互相契合。

场域是被人类赋予了情感和意义的空间。饮食活动总是在某种空间(space)中进行,从而让空间产生意义,促成空间到场域的转变。沙哈尼(Gitanjali G. Shahani)指出:“吃的行为,是一种基本的、必要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提供无尽的艺术和知识可能性的行为。”(Shahani, 2018:25)由此,文学文本中的食物刻画拥有多种阐释空间,文学食物研究也就具备了鲜明的跨学科属性,关涉人类学、社会学和医学等。食物的跨学科属性与场域的学科属性一脉相承,因此,从食物的维度研究场域具备可行性。有趣的是,这二者也有天然的纽带关系:“食物通过促成文化身份、经济机会和社会结构来创造场域,反映出二者是一种相互构成的动态关系……种植食物、烹饪和食用是全世界人们给空间注入和赋予意义的首要方式。”

收稿日期:2022-02-25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伊斯特林认知生态批评范式研究”(20SKGH1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文永超,男,四川外国语大学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认知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文永超.从“味蕾消失”到“口感如同神赐”——论《孩子的愤怒》中的场域依恋建构[J].外国语文,2022(5):62-68.

(Joassart-Marcelli et al., 2018:3)神经科学家达玛希奥(Antonio Damasio)也认为:“对人类意识的研究既需要内部视角,也需要外部视角。”(Damasio, 2000:82)来自人类身体外部的食物,通过嘴进入身体内部脏器,是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的有机结合。关于“嘴”,巴赫金指出:“人类与世界的相遇,通过嘴的开启、咬合、撕扯和咀嚼功能来完成,是人类思想和人类意象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对象。藉此,人类品尝世界,将世界引入身体并成为自身的一部分。”(Bakhtin, 1968:280)沙哈尼也指出:“嘴成了一种门槛(阈限),外部的其他东西通过它进入身体,成为身体的一部分。”(Joassart-Marcelli et al., 2018:12)有鉴于此,通过这些与食物相关的线索,莫里森勾画出场域身份构建过程和场域依恋的形成过程,进而揭示,食物是人与空间互动的一种媒介或“阈界”(threshold),黑人可以通过饮食活动构建场域身份,形成健康的场域依恋,从而找到连贯的自我身份。

1 “食物是一种窒息”:对饮食的厌恶

《孩子的愤怒》的开篇,莫里森就给读者呈现出一种对于饮食活动的厌恶情感。浅黑肤色的母亲“甜心”因为厌恶女儿(长大后改名为布莱德)深黑的肤色,认为给她喂奶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经历:“对我来说,给她喂奶就像让一个小黑崽子吮我的奶头,一回到家,我就改用奶瓶喂她了。”(莫里森, 2017:5)母乳喂养本为充满亲情和温暖的场景,却因为母亲的肤色歧视(colorism)转变为一种令人痛苦的行为。在此,莫里森借助食物活动表达厌恶,这种厌恶情绪的背后动因是恐惧。阿佩尔鲍姆指出:“厌烦是道德的或者是审美的,更可能与恐惧相关。”(Appelbaum, 2018:137)母亲甜心就是生怕自己的浅肤色在白人至上的社会里所得到的优越感被识破,所以对于肤色深黑的女儿厌烦,称之为“小黑崽子”,连喂奶都不情愿有身体接触。作为小孩成长所需的直接环境,布莱德的母亲却刻意保持距离,喂奶这种本能的身体接触都选择排斥。这种做法,从婴儿发育的初始阶段就让小孩感受不到安全的环境,为以后遭遇的各种创伤种下了祸根。认知生态批评理论家伊斯特林(Nancy Easterlin)指出:“诞生于一种安全环境的小孩一般会对那种安全环境中的人和场域产生爱意,因为从心理学角度看,那样的人和场域的功能是为小孩的未来生活提供支撑的节点。”(Easterlin, 2012:119)布莱德从小就缺失这种安全的环境,所以她整个成长的过程就缺少支撑,其场域情感也注定会被疏离和漠然所笼罩。

成年后的布莱德有了自己的化妆品事业,但是她所处的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仍然被白人至上主义的理念所支配。白人可以把黑人的身体当作食品,当作一种文化符号来欣赏。布莱德的形象设计师吉瑞告诉她:“比起黑甘草来,你的肤色更像‘好时’巧克力酱,别人看到你,就会想到搅奶油巧克力蛋奶酥。”(37)由此可见,白人将种族差异进行物崇拜(fetishization),将黑肤色作为食品进行欣赏和消费,这种观念在当代大众文化中越来越流行。针对这种现象,胡克斯指出:“对他者的商品化非常成功,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愉悦感,比通常方式的行为和情感更强烈,更让人满足。”(hooks, 1999:21)少数族裔就是这样的他者。他们被强行置入白人文化价值体系,因为“在商品文化中,族裔性构成一种香料,为主流白人文化这道令人乏味的菜提供佐料”(hooks, 1999:21)。表面上看,布莱德欣然接受这种审美,通过这种方式,她实现了丑小鸭到天鹅的蜕变,成为白人眼中的宠儿。然而,内心中她排斥这种行为,这在她与白人好友布鲁克林用餐时的心理活动可以看出来。莫里森写道:“吃开胃小菜时,我们分享着办公室的趣闻,但当鬼头刀鱼上桌时,我们咯咯的笑声停止了。普通的烧汁,鱼浸在椰奶中,上面盖着姜、芝麻、蒜和切碎的小葱。厨师竭力想把一块块平平无奇的鱼包装成令人惊艳的美食,我却不吃这一套,刮掉了鱼排上所有的东西。”(50)莫里森把白人比作掌控食物的厨师,将黑人比作鱼这种食材,供白人操纵和消费。

对此,布莱德表现出强烈的厌恶情绪,竭力摆脱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遇。她抹除了象征白人干预力量的佐料,拒绝“惊艳”而回归象征真实身份的“平平无奇”。

激发出的厌恶之感不仅体现在饮食活动本身,还体现在审美判断上。沙哈尼指出:“食物是一种景观……是审美的声明。”(Shahani, 2018:2) 布莱德的审美也围绕食物展开。一开始,布莱德常用食物类比喻丑陋的东西。比如,当她为了博取母亲的爱而诬告她的老师索菲亚,从而遭老师毒打时,布莱德如此描写自己的伤情:“我的嘴里好像塞满了生猪肝,半张脸都擦破了皮,右眼肿得像个蘑菇。”(24) 布莱德的嘴被打得变了形,莫里森用生猪肝(raw liver)这一意象来表征。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将生食和熟食定义为自然和文化、荒野和文明的象征符号(Shahani, 2018:149)。生猪肝带血,颜色紫红,还存在于口中,必然激发人的恶心感受。更令人心生厌恶的是,未煮熟的内脏还给人以蛮荒之地的联想。布莱德对他进行审美判断时,也用食物做类比。在评价她聘请的女佣时,就用了水果作为审美工具:“(布鲁克林)甚至替我炒掉了女佣露丝,因为我再也不想看到她那丰满的身材、蜜瓜似的屁股。”(64) 由此可见,布莱德认为水果是邪恶诱惑的代名词。在其他语境下,莫里森也给与水果负面的象征意义。例如,在审理索菲亚性侵儿童的法庭上,有不少证词都揭示,她是以水果为诱饵实施犯罪的(20)。总之,小说前半部分中的人物,无论是处于前景位置的女主人公布莱德,还是背景性人物母亲“甜心”,对于食物的描述总是充斥着厌恶的情感。在这种情绪的左右下,食物的属性,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是“一种窒息”(food as suffocation)(Joassart-Marcelli et al., 2018:1)。通过这种负面情感的描述,莫里森表达出对处于幽闭空间的黑人群体的同情,对将黑人看作商品的消费主义文化予以批判。

2 “味蕾消失”:同情到移情的转变

索菲亚是布莱德孩提时代的老师,因为受到布莱德的无端指控被关进监狱十几年。莫里森将布莱德设定为观察者,对索菲亚出狱后第一餐的饮食行为进行观看,以此揭示布莱德场域建构过程中的情感变化。莫里森写道:“她(索菲亚)狼吞虎咽的样子像个难民,像是没吃没喝在海上漂了几个礼拜后,开始担心垂死的同伴会在她瘦成皮包骨前分食她的血肉。她的目光一刻也不曾离开餐盘,她急切地戳刺、切开、舀起形形色色的食物。她没有喝水,没有往面包上抹黄油,仿佛不能让任何事耽误她风卷残云般的一顿。仅仅十来分钟,她就结束了战斗。”(21) “难民”一词,揭示了人物无家可归的属性,意味着场域的缺失。“难民”还发出了“一阵让人恶心的呕吐声”,这种令人厌恶的声音更加重了场域缺失感(21)。虽然莫里森详细刻画了索菲亚的进食动作和呕吐的场景,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此时的布莱德只是“藏”在车后的旁观者,在外围默默地观察。当布莱德看到侍者不停地一盘一盘地给布莱德上菜时,叙述者评述了布莱德的心理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毕竟是出狱后的第一顿饭。”(21) 从情感发生学的角度看,布莱德此刻的理解只是同情(sympathy)而非移情(empathy),原因在于这个阶段的布莱德暂时忘却了她的场域缺失感,站在更高的社会地位上对索菲亚进行情感判断:作为化妆品公司的高管,事业蒸蒸日上;儿时被母亲和社会所歧视的黑肤色如今却给她带来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恋爱方面,有男友布克在身边陪伴。对于索菲亚此时的境遇,布莱德表达同情的同时,又保持了一定的情感距离。认知文学理论家基恩(Suzanne Keen)区分了移情与同情:“移情是感受到了我们觉得是对方的情感,即‘I feel what you feel’,强调具身体验;同情则是我们对对方的感受产生了情感,即‘I feel a supportive emotion about your feelings’。”(Keen, 2007:5)

在上例中,布莱德并没有感受到索菲亚对食物的渴求,只是对于她的饥饿感报以同情。听到她的呕

吐声感到恶心的同时,又试图用金钱和礼物去帮助其缓解痛苦。这种矛盾的情感状态,是一种场域困窘(place ambivalence)。一方面,觉得自己所处的环境优越,对来自其他环境的人有排外的情绪(“恶心”),担忧外来者会破坏自己已经占据的场域的稳定性和归属感。另一方面,所获得的场域感还没有达到依恋的程度,需要通过整合新的社会关系来加固场域的稳定感和归属感。因此,布莱德需要将索菲亚纳入她的社会关系之中,试图建立一个健康的社交网络,以弥补心理上对诬告索菲亚的内疚感。

被索菲亚暴打之后,布莱德进食的器官受伤严重:“我的舌头肯定也受了伤,因为味蕾消失了。柠檬以外的任何东西尝起来都像柠檬,柠檬的味道却像盐。”(33)这种创伤一直影响着她的用餐体验,以至于到后来她独自寻觅男友布克的途中对用餐环境的认知都是负面的。对其中一次用餐,莫里森写道:“她选的那家餐馆一尘不染,却也空空荡荡(spotless and empty)。”(90)根据人文地理学,“空荡荡”正是空间的定义性特征,象征着抽象,甚至暗含威胁性(the threat of space)(Tuan, 1977:6)。没有人类情感的投射,再整洁的空间也无法转换为场域。女侍者观看时惊愕的眼神,加上点餐时对方将所点的“白蛋卷”理解为“不要鸡蛋”,暗示布莱德与此地环境格格不入。这次就餐行为没有给布莱德带来愉悦的感受,她“尽可能地咽下了这份南方人眼中易消化的一餐”(91)。与这份餐食难以消化的属性一样,侍者对她肤色的惊愕,对她饮食喜好的误解,还毫无根据地推测她会逃单,种种负面的场域体验让她更难以消化。

即使是面对拯救了她生命的伊芙琳一家,面对他们善意提供早餐麦片和面包黄油的提议,布莱德仍然选择拒绝,因为疲惫和伤痛让她仍然没有胃口。但是,她的情感已经有了细微变化,不再觉得“饮食是一种窒息”,因为她婉拒用餐的同时“希望自己表现出了足够的感激之情”(96)。促使她情感明显转变的事件是与女主人伊芙琳的养女蕾恩的交流。蕾恩与小时候的布莱德一样经历悲惨,她被母亲送去作了雏妓,后流落街头被好心的伊芙琳夫妇拯救。和布莱德散步时,蕾恩说:“蓝莓味道很苦,并不是她期待中那种野生的、甜滋滋的东西。”(113)“苦”揭示的是小女生一生经历的痛苦和创伤,“甜”则暗示她对场域、对家园的渴望(她觉得伊芙琳的家不是真正的家);“甜”则让布莱德既想象到蕾恩所经历的创伤,又想起了母亲(名为“Sweetness”)。莫里森写道:“想象这个场景时,布莱德感到胃部一阵抽搐。”(113)从4E认知的角度看^①,这种身体的抽搐动作是具身模拟(embodied simulation)的产物:即一个人的身体状态(bodily states)体验到了另一个人的情感,形成了一种具身共振(embodied resonance)。无需亲身经历,通过蕾恩的话语加上自身的想象,布莱德感受到了蕾恩的伤痛。值得注意的是,与对索菲亚的同情不同,布莱德对蕾恩产成了移情。这种情感超越了年龄的界限,深深地影响着对方。自此,蕾恩在自述中一直以“我的黑小姐”指称布莱德,所属关系透露出亲密性。布莱德也把蕾恩看作心理依靠:“布莱德听着她讲故事,感受到了一种朋友间的轻松氛围……这种友情没有任何嫉妒的成分,而是像同班女生那么亲密。”(115)莫里森以食物为载体,让人物诉说着各自经历的创伤以达到治愈的目的,表达出对食物从厌恶走向喜好,其映射的场域感由疏离走向依恋。

3 “口感如同神赐”:味觉的修复与依恋的回归

离开伊芙琳夫妇之后,布莱德最终找到了恋人布克所居住的威士忌小镇。布莱德最初并没有找到布克,而是遇到了他的姑妈奎恩,对食物的依恋就发生在与布克姑妈奎恩的饮食互动中:

一张窄桌旁放着几把搁有漂亮椅垫的椅子,布莱德坐下来,看着奎恩把浓汤舀进两只碗里。汤里有

^① 4E认知指的是 embodied cognition(具身认知)、enacted cognition(生成认知)、embedded cognition(嵌入式认知)和 extended cognition(延展式认知)。

鸡块,还有豌豆、土豆、玉米粒、西红柿、芹菜、辣椒、菠菜和零星的贝壳通心粉。布莱德尝不出那种味道强烈的调料是什么——咖喱?小豆蔻?蒜?辣椒粉?黑胡椒和红辣椒?无论如何,口感如同神赐。奎恩拿来了一篮温热的饼,在她的客人身边坐下,对着食物做了祷告。有好几分钟,她们专注地吃着,没有开口说话。(160)

受到白人文化影响,来自大都市的布莱德并不知晓偏远小镇上黑人食物的原材料,但是她第一次尝到了口感独特的美味。人文地理学家克里斯威尔说:“本土食品的生产可以唤起场域感。”(Cresswell, 2015:6))在本故事中,奎恩的本土美食生产唤起了布莱德的场域感。对布莱德而言,从味蕾消失,口舌麻木到味觉的修复,场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次的用餐行为,有沉默,有祷告,有专注,就好像一场重要的仪式,在整部小说的所有人物饮食活动中从未有过。“没有开口说话”,这种安静的、专注的饮食行为,蕴含着积极的情感,是场域依恋产生的标志。维加-冈萨雷斯说:“尽管一般与压迫和剥夺相联系,沉默也可以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对自我认识、重生和净化有益。当权力机制在运行时,沉默既有积极意蕴,亦有消极意蕴,取决于此种沉默是被迫还是主动选择。”(Vega-González, 2020:69)在此语境中,布莱德和奎恩就餐时的沉默,是一种自主行为,没有任何外在力量的压迫。以布莱德为代表的大都市富裕黑人 and 以奎恩为代表的乡下穷苦黑人,在这一刻抛弃了地域、年龄和阶级的差异,通过愉悦的用餐活动,将积极乐观的心情投射到位于穷乡僻壤的威士忌小镇,有助于空间向场域的转变。

更为重要的是,布莱德还主动分享布克的食物,进一步加强了场域依恋。莫里森写道:“她从畅想中收回思绪,坐起来,发现布克正在折叠桌边喝咖啡,神情中没有敌意,倒更像是在思考什么。于是她走到他身边,从他的盘子里拈起一片培根吃了,还在他的吐司上咬了一口。”(179)“她把麦片碗推到桌子中间,拿起布克的橙汁喝了一口。”(188)食物的分享发生在布莱德和布克的故事分享之际,因此可以说,食物分享是故事分享的一种延伸,一种强化。施奈布尔指出:“布莱德和布克所承受的伤来自几代非裔美国人所承受的暴力,从这一意义上讲,这种伤害是集体性的(communal)而非个体的。只有通过彼此互相倾诉故事,并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学会倾听,他们才能感受到自身的价值,才能作为成熟的成年人对彼此承诺、对未出生的小孩承诺。”(Schreiber, 2020:xi)群体性的伤害不能靠群体内个体的行动来治愈,只能通过群体的故事诉说和分享来实现。食物的分享,借由“嘴”这一联结外部和内部的阈界,打破了个体之间的界限,从生理和心理上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让个体生存的环境和空间变得更有价值。

布克原本对食物有强烈的依恋之情。在哥哥亚当遇害以前,他对家有深深的依恋,体现在每周六早晨“最绚烂的时刻”——母亲会端上一桌丰盛早餐:“松软酥脆、热腾腾的曲奇,雪白烫口的玉米糊,浅金黄色、鲜嫩软糯的炒鸡蛋,还在滋滋冒油的香肠小馅饼,番茄切片,草莓酱,鲜榨橙子,还有玻璃罐里的牛奶。”(125)莫里森在这里不仅详细罗列出早餐的各种菜肴,而且还运用多个形容词对菜肴的口感、色调进行细致刻画,是叙事学上的罗列技巧(唐伟胜, 2021: 62)。即使是平常周一到周五的早餐,虽然餐食的风格是“朴素的”,但是莫里森也并不吝啬词汇,也详细罗列了食品的内容:燕麦、时令水果、米饭、干豆子和手边的任何一样绿色菜——甘蓝、菠菜、卷心菜、羽衣甘蓝、芥末叶或萝卜叶(125)。这种罗列,没有将菜肴与菜肴的关系明示出来,而是让物自身显著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通过这种叙事手法,“说话人不显示任何主体意识,迷魅于周围无边无际的事物中,让物显示自身,释放出它们多样而神秘的物性,这样就给作品赋予了悠远无穷的内蕴”(唐伟胜, 2021: 62)。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罗列与并置,是一种前景化的手法(foregrounding),是物质性(materiality)与情感性(emotionality)的交汇,凸显了人物的强烈情

感——依恋。试想,只有对依恋的食物,才能注入这么丰富的情感投入和记忆投入,在离家出走多年后还记得如此清晰。在布克哥哥亚当的追思会上,提供的食物同样丰富,但不同的是,莫里森却只用了一个短句“精心烹制的菜肴一盘又一盘地送到家中厨房”来概述食物,没有详细罗列精心烹制的菜肴有哪些品种,因为对于布克而言,“这场棺盖始终紧闭着的葬礼却很简陋而孤独”(127)。紧闭的棺材,仿似幽闭空间,再现了这时的家已经不再是蕴含积极情感的场域,而又转变为虚无的空间。原本家庭内的依恋情感转变成疏离,在这种氛围下,人类不会再有享受美食的胃口。能饱餐的只有象征死亡的“蛆虫”,所以“一顿饱餐后,蛆虫早已欢天喜地地回了老家”,把孤独和痛苦留给人类(127)。

布克忘不了家庭带给他的负面情感。哥哥亚当死后,全家人逐渐摆脱了痛苦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布克始终无法遗忘创伤,对家人开启新生活的做法非常愤怒,对妹妹将亚当的生活空间(卧室)改为自己的场域更是气愤不已。布克选择离家出走,成为无家可归的人,多地辗转之后回到了威士忌小镇隐居,始终处于场域疏离的情感之中。而身处威士忌小镇的布莱德,在此阶段已经充分认识到食物对于场域建构的重要作用,所以试图用食物分享的办法重新唤起布克的场域意识。布莱德通过布克的文字写作、姑妈奎恩的讲述和她自己的具身感知,充分领悟了布克的内心世界。通过推心置腹的谈话,加上主动共享橙汁和培根的方式,布莱德试图以食物为媒介,建立起一种心理学家沃茨齐(James Wertsch)所说的认知二人组(dyad)。认知二人组是指两个人构成一种认知系统,在脑际层面实现问题解决(Wertsch, 1991:27)。一个集体要有归属感,需要无数个认知二人组,如父子、母子、姐妹、兄弟以及夫妇等。这些二人组基于相似的认知模式、情感模式和行为模式建立起来,打破彼此的界限,共同克服认知负担,旨在实现同一目标。布莱德的食物建构,让自己变得成熟,成功地在她和布克之间建立起了这种认知二人组:“他们像一对真正的夫妻那样分工合作,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帮助另外一个人。”(185)他们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这种组合,是因为布克原本熟稔食物对于场域构建的作用。

饱受伤害的布克完全把自己的内在性保护起来,从不向外人吐露他的思想,即使面对身边最亲近的人——布莱德。布莱德通过积极与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互动,以平行场域构建(horizontal place-making)的方式(言语互动、饮食互动),逐渐获得了她从未体验过的场域感。更为重要的是,她通过以分享食物等互动形式,让布克重新感受到了爱,让他感受到了场域带来的积极情感。在小说的结尾处,当布莱德告诉布克,她怀上了他的孩子时,他纠正说“不,是我们的孩子”(193)。“我们”这一称谓,标志着认知二人组的建立。二者的情感已经交汇,场域依恋已经形成:“他向她伸来了她渴盼了一生的手,她无需撒谎便能握住的手,满含着信赖与关爱……布莱德抚摸着布克的手掌……他们的视线穿过挡风玻璃,开始一起想象未来的样子。”(193)由此可见,是布莱德的场域实践让布克记忆重现,唤起了他对家的依恋和向往,让他重新找到了自我,寻获了完整的、健康的场域依恋。

4 结语

场域的构建是一种蕴含了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等多种感官手段的具身体验,味觉体验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莫里森在《孩子的愤怒》中,通过女主人公布莱德对食物的情感态度变化以及与其他人物的饮食互动,勾勒出场域和家园建构的完整轮廓和轨迹。对食物的厌恶情感,是人身处幽闭空间时的疏离情感的具身反应,而对食物的依恋情感则是健康场域感形成的标志之一。通过食物书写,莫里森揭示出:对食物的依恋既是对黑人传统的尊重和传承,又是促成连贯的场域身份和自我身份的必要元素。

参考文献:

- Appelbaum, R. 2018. Existential Disgust and the Food of the Philosopher[G]//G. G. Shahani. *Food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khtin, M. 1968. *Rabelais and His World* [M]. Helene Iswolsky. tr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resswell, T. 2015. *An Introduction* [M].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 Damasio, A. 2000.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Body, Emotion and the Making of Consciousness* [M]. London: Heinemann.
- Easterlin, N. 2012. *A Biocultural Approach to Literary Theory* [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hooks, b. 2015. *Black Looks: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M] New York: Routledge.
- Joassart-Marcelli, P. & F. J. Bosco. 2018. *Food and Place: A Critical Exploration* [G]. New York: Bowman & Littlefield.
- Keen, S. 2007. *Empathy and the Novel*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rumholz, L. 2008. Blackness and Art in Toni Morrison's *Tar Baby* [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49) 2: 263-92.
- Proshansky, H. M., Fabian, A. K. & R. Kaminoff. 2014. Place-Identity: 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G]//J. J. Gieseking, et al. Eds., *The People, Place, and Space Reader*.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Schreiber, E. J. 2020. The Power of Witnessing: Confronting Trauma in *God Help the Child* [G]//A. K. Eaton, M. L. Montgomery & S. A. Stave. *New Critical Essays on God Help the Child*.
- Shahani, G. G. 2018. *Food and Literature* [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uan, Y. -F.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Vega-González, S. 2020. "Let the True Note Ring Out Loud": A Mindful Reading of *God Help the Child* [G]//A. K. Eaton, M. L. Montgomery & S. A. Stave. *New Critical Essays on God Help the Child*. 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 Jackson.
- Wertsch, J. V. 1991. *Voices of the Mind: A Sociocultural Approach to Mediated Action*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唐伟胜. 2021. 为物所惑: 济慈颂歌中的复魅叙事[J]. 外国文学研究 (2): 58-69.
- 托妮·莫里森. 2017. 孩子的愤怒[M]. 刘显含, 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文中只标注页码的引文均出自此书).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 Attachment in *God Help the Child*

WEN Yongchao

Abstract: Human projects emotions and meanings onto space, turning it into place. According to sensuous geography, food outside of the human body enters the internal organs via mouth, break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world. This practice is conduciv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healthy sense of place. Based on the female protagonist Bride's altered place affect in *God Help the Child*, Toni Morrison aims to articulate that food constitutes a medium or threshold between human and space in their interaction, and that food attachment and place attachment work in tandem. She also emphasizes that through the act of drinking and eating, the black people are able to construct place and a healthy sense of place, thereby acquiring a coherent self-identity.

Key words: food writing; space; place; place affect

责任编辑: 李小青